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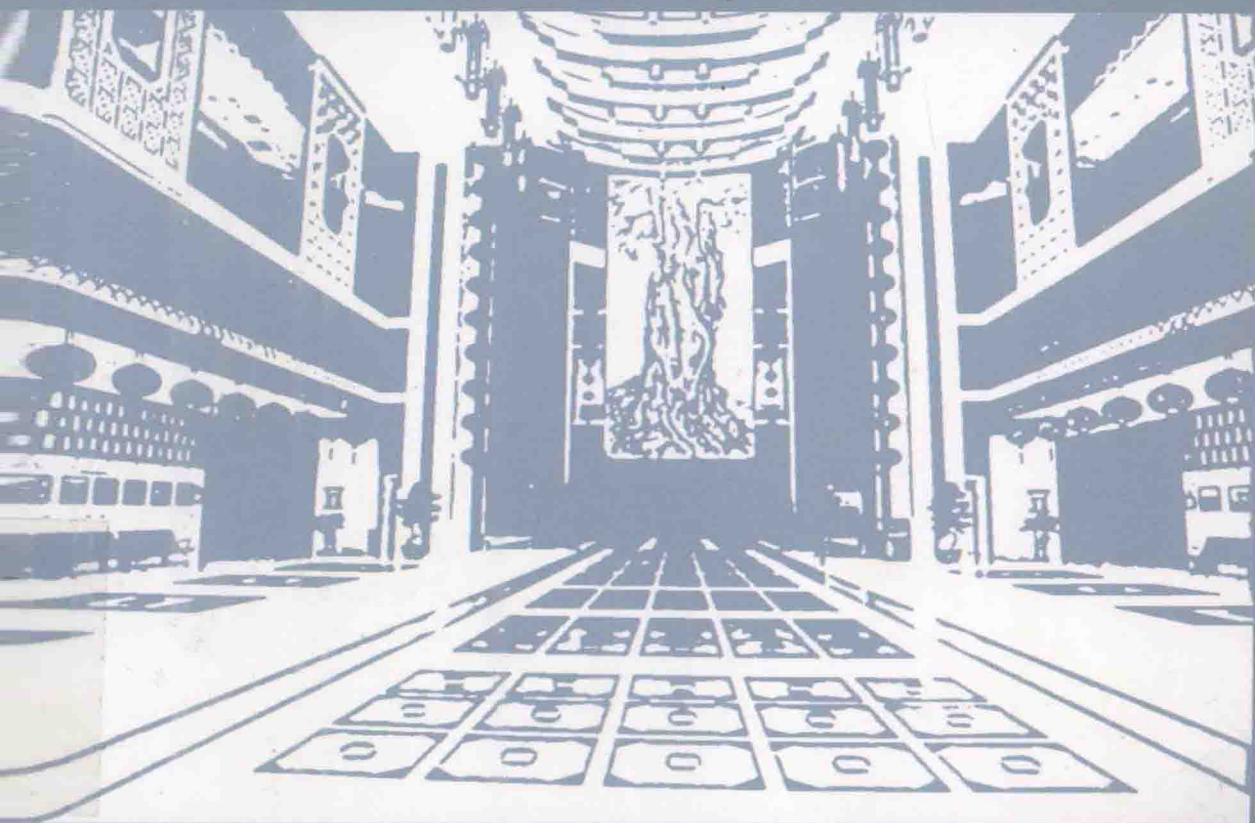
西岸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主办

XI AN
WEN SHI JI KAN

文史集刊

第二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西岸

文史集刊

第二辑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主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岸文史集刊. 第2辑/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主办.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334-6291-8

I. ①西…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8873 号

西岸文史集刊 第二辑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主办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3

字 数 495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291-8

定 价 7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主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主编：陈健鹰

编辑：（按姓氏笔画）

王 湛

庄小芳

庄清海

李照斌

林裕竣

黄晖菲

黄筱雯

目录

一、历史纵横

明代福建新县和地区中心的出现

——以县城筑城为中心 元廷植/3

清代福州工匠与台湾城市化的起步 徐晓望/20

荷据后期台湾汉人长老何斌的家世及事迹 刘彼德/28

清代台湾土地开发者的特质及其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蒋宗伟/44

厦门厦港沙坡尾海洋聚落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 张敏/55

日据时期台湾泉籍士绅与日本官绅的交流

——以万华洪氏家族与木村匡为例 卞凤奎/65

航道变迁与港市社会经济的关系研究

——以日据时期台湾新港为例 陈永江/84

清季台湾士绅转型与台湾盐业

——以施士洁为例 郭叔/91

略论清末民初泉州士绅群体与地方文化的构建 庄小芳/104

二、田野札记

闽南视域下之大陆高山族浅析

——以邓州与华安两个家族为例 施沛琳/119

金门陈坑南方宗祠莫安仪式 汪春春/136

头发的纠缠

——厦门“菜姑”身份认同探微 魏婷婷/162

闽南婚俗的文化透视

——以安溪县八社为考察地 钟建华/179

闽南宗族村落田野调查反思

——以社坛村为例 黄晖菲/191

三、学术论谈

港台道教历史与学术研究现状 黄海德/205

日据时期台湾民俗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解析 蔡昇德/236

现代闽南概念及闽南文化探析 陈名实/269

闽南文化的相关概念和问题 陈耕、晓罗/275

四、文博园地

南安皇冠山六朝画像砖墓中的佛教形象研究 马天行/291

闽北松溪流域六朝墓葬的考古学观察 亓惠林/302

略论漳州窑兴衰缘由及其历史地位 林登山/313

五、文化图像

明清时期畚族盘瓠传说的再发明及其原因 石奕龙/323

惠东方言和民俗的历史文化解析	郭志超/334
台湾艋舺“呷新娘茶”四句联举隅	郑卜五/341
浅析 18 世纪末巴达维亚华人妇女的婚姻地位	上官小红/353
闽南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以晋江安海“嗦啰哩”为例	王宛真/361
台湾弥勒信仰探论	何绵山/370
台湾凤山关帝信仰文化回传泉州考略	李国宏/385
泉州城历史宗教地理与神圣空间的争夺	林雅婷/395

六、姓氏源流

泉州的宗族及其文化	黄英湖/417
高雄红毛港李氏始祖原居地初探	陈桂炳/428
千年古镇 百姓聚集	
——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姓氏文化调查	纪谷芳/434

七、文献梳理

西来庵事件史实考辨二则	郭伟展/449
近代来华传教士笔下的闽南民系文化特征初探 ...	吴巍巍、洪龙山/460

八、读后有感

一部充满现实关照的创新力作	
——《台湾光复初期教育转型研究（1945~1949）》评介	
.....	庄恒恺/475

一
历史纵横

明代福建新县和地区中心的出现

——以县城筑城为中心

元廷植*

明朝中期新县设置以后，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变化，县城的空间性也发生了变化。这篇文章就是对这部分相关内容的解读。^①

明朝中期，福建新县的设置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积极应对地方社会成

* 作者单位：韩国江原大学。

① 新县的设置在早期开始是以“地方统治”的政治观点被关注，以制度史和行政运行的研究为主。不过1990年以后地方、区域社会及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重新呈现了县的重要性，并对有关县的设置和废止进行专门研究，积累了一些以地区为对象的具体事例研究，使县的政治、社会意义为大家所知。但新县的事例与全国性的相比，已进行的研究事例只是其一部分而已。从这方面看现在的实情是迫切需要对更多地区的事例进行研究，对多样的主题进行发掘，并且对同一地区的研究也应依据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在对比历史相近的方面进行新的方法研究和观点发掘，这也是很重要的。此时县的文化职能已经被关注，追溯新县登场以后的社会文化变化也是其中一部分。对于研究史，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章，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章参照，以下已出文献的情况，以‘柏桦，2003’的方式标记。

长的结果。^①即新县设置的地区总体上在人口增加和地域开发方面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其也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高危地区。

社会的不稳定出现了叶宗留及邓茂七的叛乱。这不但威胁到了国家政府和地方权贵阶级对地域的统治，还威胁到了地区居民的生存。此时明朝派遣兵力镇压叛乱，同时也促进了作为长久安定之策的新县设置及地方社会的支持。

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与新县设置同时建造县中心的县城。但是由于需要大量的物力，在15世纪设置的新县当中，也确实发生了未能建造完成的情况。16世纪，由于以福建为首的中国东南部地区社会极不稳定，没有城墙的县都修筑了城郭，以此来确保健全县城作为县的统治场所职能。如果说新县的设置在某种意义上使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心，那么可以说这个中心地的确立是在县城的修建以后。

那么这个中心地能给县城及周边地区带来怎样的社会文化改变呢？是谁主导了那些变化？百姓和国家权力该怎样去应对？这样的变化在地方志和地图上应如何表现，其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既是对中国历史中国家权力安顿地方社会过程的理解，也是对地方社会的文化传播、扎根及变化的理解，并且最终为理解“中国”的历史融合过程及传承性方面可以提供基础资料。

从这些文字来看，是通过县城的重要设施及空间变化来追溯新县的社会文化变化。因为我认为这种社会和文化是理解“中国”历史性融合过程和传承方面的基础。另外，以物质空间变化为中心展开研讨是为了能更具体化分析那些抽象化的社会文化变化。不过构成县城的主要设施及空间的变化是非常多样的，所以为了便于分析新县的运作，可以以其中最重要的城墙、县厅、学校为中心进行分析。

^① 明代福建新县没有特别的注释，请参照以下的研究。青山一郎：《明2明代の新县设置と地域社会—福建漳州府宁洋县の場合—》，《史学研究》101—2，1992；元廷植：《明代中期福建省建置新县的理想与现实》，《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陈支平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元廷植：《15—16世纪福建的新县设置和其意义》，《江原史学》19—20，2004；元廷植：《明中期福建的新县设置运营和宗族社会》，《明清史研究》27，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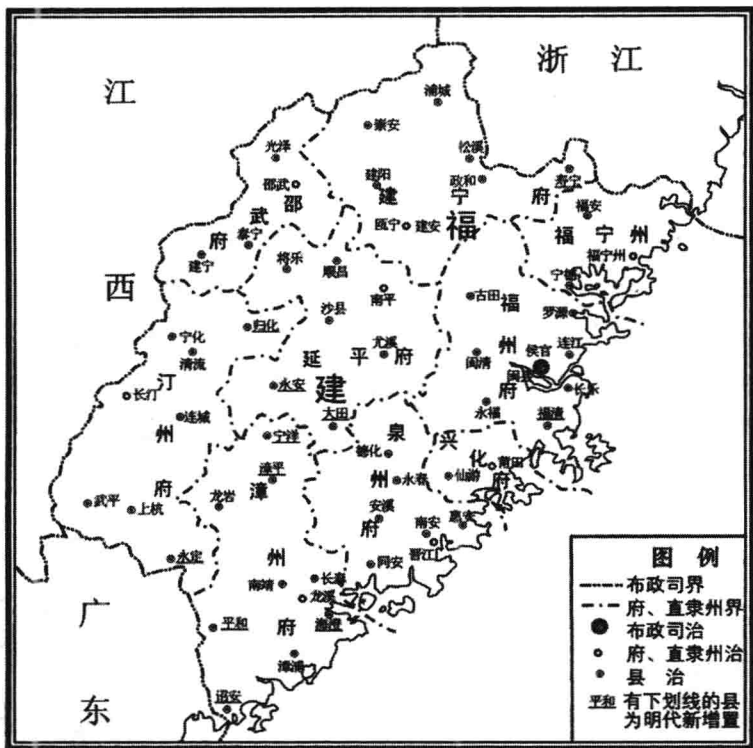


图1 明代福建新县

出处：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二

在福建，县被新设的地区是位于与现有县相距甚远的外围。15世纪后半期，有关漳平县的建设理由，吴仕典讲道：

漳郡据全闽之胜以控岭表，逮我皇明成化六载始辟漳平为郡属邑。按地志去郡四百里，东抵安溪，西界龙岩，南连南靖，北亘永安。山陆险塞辽阗，不时流寇莽伏其间。于是置县治以扼潮赣之栈道。^①

^① 道光《漳平县志》（蔡世钺修，林得震等纂，道光十年刊本，漳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2年），卷9，艺文志（上），第298～299页；吴仕典：《筑城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卷9上，15b～16a，第342～344页。

漳平县是与漳州府相距甚远，与安溪、龙岩、南靖、永安毗邻的边缘区。由于这里是江西赣州到广东潮州的流寇要道，是为统治这里而设置的。漳平县设置的目的是对外围的国家权力统治，从这方面来看，与其他新县并无太大区别。

作为外围的新县地区在地方志收集的地图里也很明确地被标识出来。比如说明代福建最后的新县——宁洋县是由东西洋巡检司龙岩县集贤里的5图、大田县集贤里的3图及永安县分离一部分而组成的。东接大田县，西接龙岩县，南接漳平县，北接永安县，与各县城相距200余里。从图2《龙岩县治（嘉靖三十七年）》来看，后来成为宁洋县中心的東西洋巡检司和集贤里在地图的右侧边角处标记，这就是证实外围存在的例子之一。



图2 龙岩县治（嘉靖三十七年）

出处：嘉靖《龙岩县志》，汤相、莫亢纂修，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另一方面，县设置以后地方志的地图上也作为新的中心地的县城位相清晰地标识出来。例如在图3《漳州府治图（万历元年）》中，新县宁洋县和龙岩县一样以府城为中心，把县治以城郭的样子明确标识出来。在漳州府志里，宁洋县以城郭明确标识是为说明由于县的新设，漳州府内部也是征收税金和徭役的地方，成为学生辈出、祭拜孔子和圣贤的单独教化的单位。还有从漳州府的立场意味着需要管理和考虑的单位登场了；从宁洋县的立场则是明示着在漳州府内作为单独的行政单位的位相能得以确保。这和图4《漳平县境图（嘉靖二十八年）》、图5《宁

洋县治图（万历元年）》、图6《平和县治图（万历元年）》一样，从各县治的地图上更加清晰地标示出来，县城位置被标示在地图的中心，与县城的周边区域相比，其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和醒目程度，较之两者的实际比例而言要大出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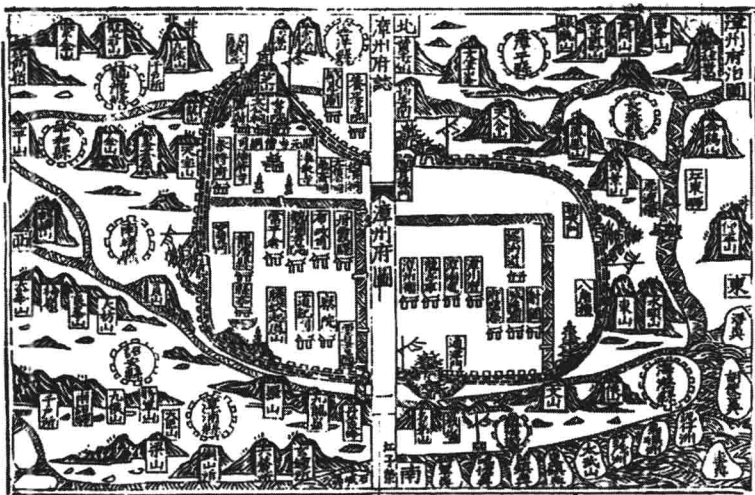


图3 漳州府治图（万历元年）

出处：万历元年《漳州府志》，罗青霄纂修，万历元年刻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



图4 漳平县境图（嘉靖二十八年）

出处：嘉靖《漳平县志》，朱召修，曾汝檀纂，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38，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从县整体来看，县城所占的比重根据各自县的情况多少有些差异。例如宁洋县是明代福建的新县当中最晚设置的，县的面积也比较小，县城成为县的中心地没有大问题。但平和县面积宽广，地区间隔绝严重，县城不仅向西偏近，而且管辖区域里还有明代以前县治设置的地区，所以集中度比宁洋县弱。图5《宁洋县治图（万历元年）》和图6《平和县治图（万历元年）》比较时，平和县在整体地图中占有的县城大小比重较小。还有虽然将县城放在地图的中心标记，但县东部以小溪（以前的南靖县治所在地）为主，收集了铜壶、坂仔、西山、五寨、河上、南胜、西林、大溪等重要的地区名称。这在大约是150年以后画制的图7《平和县图（康熙五十八年）》里更为清晰。从康熙五十八年的平和县图可以看出，在康熙年间，经过一段时期的社会发展，平和县的区域内除了县城之外，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发展，变得更加重要了，这些地区在平和县所占的比重也变大了，相对而言，县城的比重却变小了。^①

作为中心地的县城就是将县厅、县学各自的空间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逐一展示出来。例如从图4《漳平县境图（嘉靖二十八年）》能看出，被层层高山包围的漳平县城巍然耸立。县城在地图的中心有四个门，里面虽然收集着“漳平县”和“儒学”这样名字，但县城外的里、司、铺等仅做了简单标注。此外城墙是保护居民的防御设施，县城可以说是保障人们安全的空间。其里面以“漳平县”和“儒学”标记，明示着统治者维系国家权力，是具体体现儒教理念的空间。因此城墙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全方面起到将中心与外围、文明与野蛮划分的作用，以城墙环绕的县城对周边地区是文明的象征、文化的中心地、国家权力的体现、危难时的避难所。

^① 从同一时期平和县的主要姓氏和土堡的分布也可以确认此现象。元廷植，2007，第122~123页，表2《平和县姓氏、土堡及功名》可供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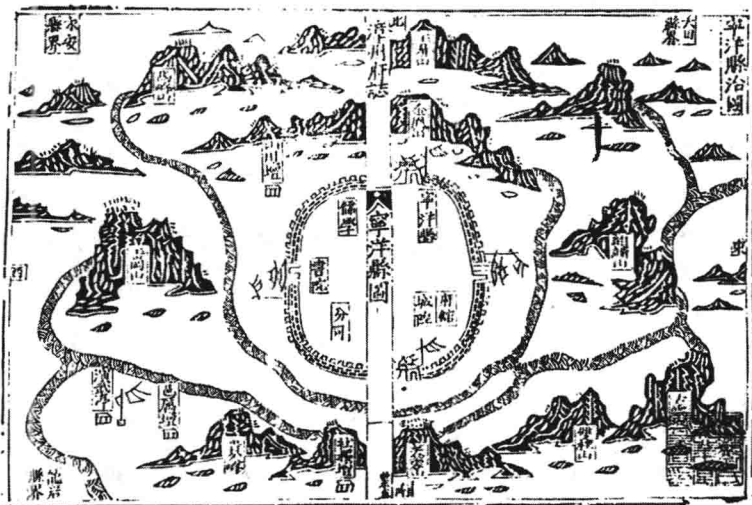


图5 宁洋县治图（万历元年）

出处：万历元年《漳州府志》，罗青霄纂修，万历元年刻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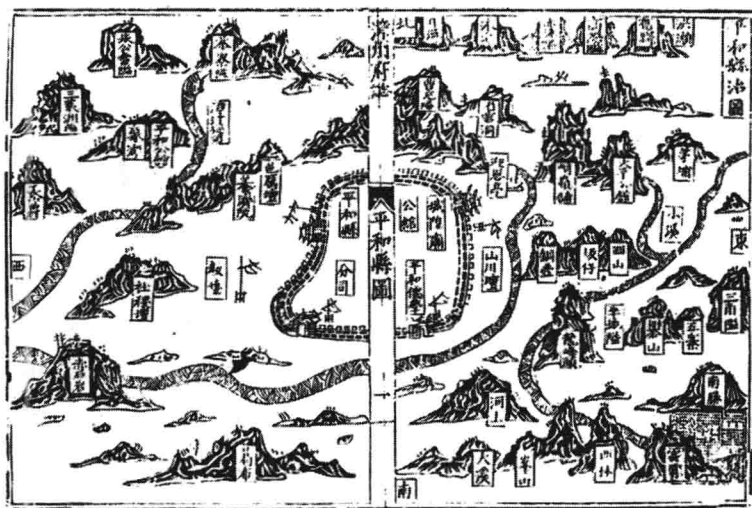


图6 平和县治图（万历元年）

出处：万史元年《漳州府志》，罗青霄纂修，万历元年刻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



图7 平和县图（康熙五十八年）

出处：康熙《平和县志》，昌天锦、蓝三祝、游宗亨等编纂，康熙五十八年刻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由于城墙是县的设施当中最基本的设施，城墙建设是为了统治和人民的安全需刻不容缓，是国家权力和地区社会共同关心的要事，也就是说15、16世纪设置的福建的县都是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设置的。大部分居民经受着叛乱和镇压的苦痛，最终也积极参与了县的设置。从国家的立场看，新县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统治与现存的县城相距甚远的区域，起先是为阻止叛乱骤起，不得不致力于其中心地的县城筑造。

15世纪设立的县当中，虽然也有来不及垒城墙而只建筑县厅和附属建筑物的事例，但没有城墙的县治还不能充分达成作为新县的目的，漳平县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漳平县于成化六年（1470）7月受皇帝的许可，次年在九龙乡设置县治。县设置初期，如图8《漳平县地图（正德八年）》所示，只用桎梏标记，没有城墙。正德九年（1514）知县徐凤岐击退侵入县界内的流寇，推进了县城建设。^①对此在吴仕典的《筑城记》里做出如下叙述：

规制草创而城垣未设，弘治辛亥（1491）流寇突至，为民梗者屡。因循距今四十载，坏日以积。故指漳平为陋邑，舟楫罕到商旅不肯游，

^① 道光《漳平县志》，卷8《人物志·名宦》，第230页。